

目 录

沦陷生涯·····	楼适夷 (1)
对抗战前后余姚几个头面人物的追忆·····	林 泽 (8)
郭静唐与倪永强·····	杨 光 (13)
“五·卅”运动在余姚·····	姜枝先 华家乐 (20)
盐民的抗暴斗争·····	市文史办整理 (24)
平生三到余姚记 ·····	<u>阮毅成</u> (39)
四明山上的回忆 (下) ·····	<u>蔡竹屏</u> (45)
余姚交通史述·····	诸焕灿整理 (77)
步履艰难的余姚电力·····	夏朝火 俞志浩 (84)
立大肥皂厂的兴衰·····	朱伟伟 胡 原 (87)
工商业同业公会一瞥·····	胡 原 (89)
丹青吐艳 草编溢彩·····	张世良 (93)
浙东银行概述·····	市人行 (97)
中央储备银行余姚办事处始末 ·····	金理祥 (107)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初探 ·····	沈敖忠 (109)
一生心血为儿童 ·····	楼炜春 (119)
忆私立舜耕小学 ·····	陆凤阁 (125)
姚北的第一所中学 ·····	朱可淦 (129)
也谈府前路小学 ·····	郑逸群 (131)

创办惠民医院	吕洪章整理 (134)
一次医师登记活动的始末	孙儒堂 (136)
毛契农先生简传	陈曙华 (140)
先父韩厥修生平事略	<u>韩波平</u> (147)
纪念先父百岁诞辰	韩金镛 (160)
邳海沧桑六十载	苏 清 (162)
谈余姚的堕民	吕衷才 (171)
说“堕民”	诸永康 (177)
试论余姚腔的兴衰	郑 闰 (180)

沦陷生涯

楼适夷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前夕，我们一些在上海“孤岛”同作半地下式工作的同志，工作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多数人先后陆续离去，留下的已寥寥可数。留守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梅益同志，多次动员我迅速撤离，去苏北根据地。经常在一起的许先生（广平同志）离不开鲁迅先生留下的藏书和遗物，我则拖着一家老小，特别是久病恹恹的老母，不知如何安顿，迟迟不能成行，一直拖到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正在我们自费出版的一个文艺小刊物——《奔流新集》最后一期，还不及从印刷厂运出，上海周围的日军，就象潮水似的涌进了租界，“孤岛”在黑潮中淹没了。这才开始了真正的沦陷生涯。日寇一进租界立即搜捕抗日分子，文化界平时活动比较显露，首当其冲。留守在上海的巴人同志爱人王小洛，突然急呼呼跑来通知：“许先生一早就在家被逮走了！”当时刚满十岁的海婴，由保姆藏在被窝里，没被带走，天一亮，就自个儿找到小洛，要她帮助通知朋友。

我的地址虽一向保密，但总有些人知道，当然非立刻转移不可了。但上海的房子早已要用金条租赁，无论如何想不出一个可以收容一大家子人的地方，便决定回浙江余姚老家。老家沦陷已两年，沦陷时全家均已跑开，留下一座无人的空宅。日

军进入县城，挨户抄家，把大门撞开，翻箱倒笼，肆意洗劫，搬走了要搬的东西，特别我学生时代从东京带来的几柜子日文书，可能投合了他们的胃口，陆陆续续被劫一空。以后大门一直开着，里巷间无处逃难饥寒交迫的老乡，乘机进来摸走一些衣物器材，才到秩序稍定，才由留在家乡的亲友代我们收拾了这个破家。现在是，除了这个破家再也没有可去的地方了。

许多热心亲友帮助，拉关系、找路子，四处奔波，好容易买到了船票。船停靠在隔江的浦东码头，一家带着累累赘赘行李包裹，扶着一个举步艰难的病人，渡江到了浦东。江岸黑压压一片，万头攒动，全是狼狈不堪的回乡的难民，日本宪兵象凶神恶煞似的监视两旁，他们的爪牙手舞皮鞭大声吆喝，要随时悄悄在他们手里塞上几张伪币，才能通过重重关隘和刁难，排上栈桥行列，攀登船梯，有些人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就带同背上的包裹一起被拉出了行列。人好象进入了阿鼻地狱，小的孩子吓得哭了，被扶着的老母还不时地要瘫痪下去。但终于在统舱里找到了一丝缝隙，算是安顿下了，四周是一片鬼哭神号的世界。这回才真正体会到人是万不能当亡国奴的。

家是破的，总还是一个家，得到在乡亲友的帮助，草草把破烂儿收拾一番，到可以居住的程度。原来我离沪时与梅益同志约定，把家人送回老家安顿好，马上只身回上海，同他一起去根据地，他本来早就要走，只因等待我们几个人才留在危险的上海的。可我又不得不失约了，久病的老母经过一番行旅的折腾，一回到家，便颓然地躺倒床上，再也起不来了，一时进入垂危的状态，好象快会崩溃。在这状态下，我只得再一次背信同志。母亲一边喘息，一边流着泪对我说：“你父亲死了二十年，我为你担惊受怕苦了二十年，这一回，你一定别离开

我，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去吧！”我想时间总不会太久，在家容易隐蔽，就满足老母这个愿望，决定陪她到最后的一天。

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明智的。日本宪兵从许先生家里抄到了一本我签名送她的书，宪兵用酷刑迫许先生交出我的住址，一直使用了电刑，迫得许先生无法忍受，就胡乱招供我一年前早已迁出的旧址，宪兵果然到那里去扑了一个空，查起房东来我的确住过，不算胡供，才免除了再一次的酷刑。这事情当初我并不知道，有一次去上海，许先生已经出狱，听说我来，叫人约我到黄幼雄家里见面，自己向我表示了歉意，我只流着眼泪握紧了她的手。

在上海，夏丏尊老师受法藏寺的委托，正担任从日译本转译《南传大藏经·本生经》的工作，篇幅很大，他要我帮助他。陪伴在母亲的病床边翻译佛经，这对隐居家园的生活成了最好的掩护，深居简出，与外界没有往来，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知道，上家里来看了我。一位亲戚原是地方工商界头面人物，舍不得老大家业和房族委托的财产，恰巧当地甘心投敌当维持会长后来当伪县长的一个汉奸，特别看中了他，拉他任伪商会会长。他不听我的警告居然下水，又对我口口声声发誓决不给中国人干坏事，利用地位，尽可能给地方减少一些敌伪统治的祸害，实际他也这样做了。他三天两头上我家闲谈一些敌伪内幕和四乡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我的信息是灵通的，同时还无形受到了保护。

母亲在病床上虽一次次进入危急状态，又一次次奇迹似的转危为安。多少年不容许我回乡安居的当地一些党棍子，这回连自己也脚底抹油不知去向了。敌伪统治的新贵们，了解我情况的不多，因此留在家里反而安全。

静静的、静静的夜，耳朵里好象只有嗡嗡的微响，在一盏孤灯下凝视着昏昏沉睡的病人，我觉得好象身处一叶孤舟，飘荡在一片漆黑的大海里，四处茫茫望不到一点边岸。脑海中展开一幕幕祖国大地浴血抗战的情景，颠沛在流亡道路上成千上万的难民，活跃在前沿、后方为抗战而奔走呼号的同志，和转辗敌人牢狱血腥鞭撻下的受难者，心头无限的激动和感慨。想到那一天，抗战胜利的日子，和隔绝的朋友们重新见面，他们问我：“在那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我将怎样回答呢？我便每天发心记下一段日记，把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一个日本宪兵带着一条恶狗，在街头横冲直撞，见人就咬。一些贫苦的升斗小民，好不容易下乡背回一些粮食，在封锁线给扣除了，剥光了衣服，光身跪在太阳底下示众。忽然大门外人声鼎沸，一群敌伪军簇拥着几个衣衫破碎血肉模糊的囚人，是押到东边小山脚下去行刑的。有些贫家妇女，莫名其妙地被捉去，关在原伪银行大厦的房子里，供兽兵们日夜泄欲，伤心惨目，真不知人间何世，使人听了心里流血。同时也有乡间劫来，屯积在仓库里的棉花，突然失火烧毁了。一大群敌伪军，威风凛凛，吹着军号，一清早下乡抢粮。到了傍晚，弃甲曳兵，狼狈而回，还跟着几副担架，躺着流血的伤兵，引起街头观众的微笑。后来老家又经一场洗劫，再也找不到这日记本了。

一次，我上海呆了几个月又回到家乡，下了内河小轮，手里提个旅行包，挤到码头。行李须经过日本宪兵检查，码头上早堆成一座小山，只一个宪兵慢吞吞翻弄，那宪兵正是街头上咬狗咬人的家伙，我的行李包在他手边，他偏不理，我急于回家探视又入垂危的母亲，等得不耐烦了，情不自禁地脱口用日

语催了他：“这是我的包，请检查一下。”他听了日语吃了一惊，抬眼狠狠望我一下，便提起包来狠狠一摔，扔到码头外边的河滩上，算是对我的答复。我一言不发，行李也不要了，扭头便往家走。家里离码头只十来分钟路，很多人惊奇地望着我，我头也不回地到了家里。

家人认为这次可闯了大祸，得罪了“皇军”可不得了，反正我行李也不要了，看他怎样来吧。过了约二小时，宪兵大概把那小山全检查完了，派码头上看热闹的孩子上家来叫我：

“长林叫你去取行李！”这凶恶的宪兵叫长林，街上已出了名。我说：“行李扔到河滩里，我不要了。”好多人认为我这样不好，还是去取回来吧。都自告奋勇卫护着我回码头。行李已从河滩上搬上来了，长林守在那里。他问：“这是你的行李？”我说：“是！”

“为什么你不取行李就走？”

“你不是已经摔到河滩上去了吗？”

“你为什么不等等？”

“我离开家久了，家里母亲病危，到了家乡，急着回去看看，等不及你检查，便先走了。离家已久，急于回去，这心情大概你也了解吧！”

一番日语的对话，可能引起他的乡思，他没说话，迟疑了好一回，说：“拿回去吧！”

我这凭一时冲动的轻率行为，当场虽没事，却从此引起了宪兵对我的注意，知道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个人。过了不久，我那位当伪商会长的亲戚来告诉我：“宪兵队长小林，不知怎样知道了你，要上你家来拜访。”黄鼠狼给鸡拜年，还有什么好事。我想，这回麻烦了，连家里也不能安身了！他立即说：

“你别着急，我和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已经代你婉言辞谢，告诉他你家有病人，不便待客，盐务局长早想请小林吃饭，决定由他备饭，到时邀你参加，就可以在席间见面了。”他听说请客，就同意了。所谓盐务局长，说起来也算我间接亲戚，多少知道我一点，曾同伪商会会长来访问过我，大概也不过表表不得已落水的心曲，给自己留个后步。我也随便敷衍几句。他们想出这个办法，苦心为我打掩护，是可感谢的。我问明了宪兵队对我了解的程度，心里有了些把握，知道完全拒绝反而不好，便决定去见这位队长。

宪兵队在城里是阎王殿，这小林的行径也听到过一些。一次在车站检查旅客，遇一个跑单帮的年轻单身女客，便扣住了人家的“良民证”，要她晚上到某处去拿，就关起门来把人强奸了。可这回我遇到的却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自称还是个帝大生，带着满脸的笑容，表示同我的幸会，说了好些恭维话。人家已经向他介绍，我虽有了一段经历，早已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人和笃信的佛教徒，现在上海当银行职员，暂时回家陪伴卧病的母亲。我也就用这个身份同他说话，尽力绕开政治性话题，表示对当前局势不加关心。宴会搞得很丰盛，请了许多陪客，全是当地当时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一青年是一个伪乡长的兄弟，后来在四明山重新见他，是个共产党员，并知道那伪乡长也是党里派去的。热心的陪客们热闹地谈着吃喝玩乐，时时干扰队长对我的谈话。他知道我到过日本，我乘机表示对学生时代东京生活的怀念。他一次次把话题引向当前局势，我一次次设法绕开。他问我对战争的看法，甚至说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四明山上有没有我的老友？我能不能给地方做事？厨房也配合得很好，话到紧要关头，一盘热气腾腾的大菜端上来

了，大家一哄而起，拉他下箸，不断地一轮轮劝杯敬酒，直灌得他酩酊恍惚，说话舌头含混起来了。

约摸化了三小时，一场鸿门宴终于混过去了。回到家里，病床上的母亲正折腾得不行，见到了我忙说：“你走吧，你赶快走吧，反正在家就让我一个人死好了！”我知道越这样时机越不能动，就镇定地呆着，照例在病床边搞释迦牟尼，一直维持到母亲在我怀里停止最后一口喘息。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抗日根据地，在离开县城只有20多公里的山里，步行4小时就到了。纵队里黄源同志、陈山同志知道我隐居在城里很不放心，常托进城卖柴的老乡来探望我，给我送来文件和情报，要我快上山去。城里有些青年想投奔新四军，找我写介绍信，我早就成了一个联络点。终于，到了我自己的时候了。有一次，游击队袭击西乡的一个镇市，俘走了一些伪军人员。伪商会会长来找我，由他分配在那边电话站当电话员的人给俘去了，家里人哭哭啼啼向他耍人，问我可不可以通个关节，让山里放回来。我故作迟疑地说：“是不是让我自己去跑一趟！”

他听了大为高兴，马上商量如何走法，正面直接进山关卡太多，决定从水道远远绕过去，得化两天路程。于是，一只失群的孤雁，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转载《群言月刊》1987年11月号）

对抗战前后余姚几个头面人物的追忆

林 泽

我在余姚任职六年多，时值抗战前后，共事者甚多，兹择有关人和事，就记忆所及，略列之。

倪永强

倪永强在余姚先任县党部常务委员，嗣因体制改变，继任书记长，共四年，1939年调往温岭。在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关系上，他是属于浙东方青儒系统的（方系浦江人，曾任浙江省党部书记长、社会处长），即外间所称的C.C.派。倪善钻营，后来与C.C.派要员拉上了关系，腰板硬了，手段也辣了。在余姚时，他十分注重扩展个人势力，有一批属于他的嫡派强有力的人物。在抗战初期，他还热衷于搞自己的武装力量，只因党政发生摩擦，因省保安司令部有命令，不准政府机关以外组织武装，所以受到县政府的制止。欲望不能得逞。后来，又借驻浙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批准旨意，企图再搞，县政府因未见明文，坚决不予同意。所以也没搞成功。

当我在1934年4月任余姚县长时，余姚老一辈的绅耆很有力量，他们的代表人物都与在上海的余姚金融界巨子宋汉章、史久鳌、潘久芬等有来往，他们看不惯倪的所为，表面应付，

内心不满。在这些矛盾中，县政府明辨是非，自然比较接近绅士而应付县党部。那时浙江各县几乎普遍存在党政之间的分歧。抗战发生，余姚濒临前线，老绅士们都有身家性命的顾虑和对倪的不满，很想逃难躲避，我们经过考虑，便因势利导，劝他们帮助募足救国公债40万元和抗卫经费20万元后，赴沪暂避，保证他们家庭财产的安全，不以脱离抗日阵线论。这点，在黄绍竑颁布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十条中有此规定。

1938年2月，余姚政治工作队成立以后，由于队员们遍布乡村，热情地发动和组织群众，一时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把原来暮气沉沉的余姚，搞得轰轰烈烈，政工队员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这好象触犯了县党部，他们要政工队员入国民党，被政工队婉辞拒绝了，他们暗中派人潜入政工队猎取情报，又被政工队员揭发而孤立了。于是他们大造谣言，诬蔑政工队给共产党占据了地盘，大喊大叫说余姚赤化了。县政府认为抗日无罪，不予理睬，依然支持政工队员的热忱工作。党政摩擦加剧，甚至发展到不断向上控告，指控我纵容包庇异党分子。省党部派委员吴望伋、绍兴区党务特派员傅文象多次到余姚调查，也正式提出调解党政分歧，但都被我否认，推托敷衍过去。我自有主张，即他说他的，而我做我的。后来，监察使金汉鼎上将来，过问其事，县政府也同样理直气壮地说，抗日是真，分歧是假。这里有省主席黄绍竑的支持和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宣铁吾的谅解，致使省、县党部企图扼杀余姚政工队的阴谋未能得逞。最后，省党部不得不建议同时撤换我和倪永强，但是也没有被黄绍竑所采纳。经过这样复杂的摩擦和斗争，1939年春倪永强终于调任温岭县县党部书记长。以后，县党部书记长先后换了周学湘、柯宗晦、姚赞唐。

阮毅成

阮毅成约在1935年前后回浙，先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驻地在金华。抗战爆发，黄绍竑二度主浙，约1938年间，民政厅长王先强离浙，由阮毅成接任，这样，他当了十来年的民政厅长，至1948年7月去职，由杜伟接替。阮是阮性存（荀伯）先生的继子，曾留学法国，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因此对该校关系甚深，在政治上属国民党二陈C.C.系统。自他任厅长后，其待人接物和处事作风，有点像二十年代末的民政厅长朱家骅，风度翩翩，精明强干，官运亨通，口碑不坏。阮的政治活动，有人归纳为三个字，曰“行新政”。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头禅。“行”是指浙江省行政学会，阮毅成非常着力于这个组织的建立和扩展，名义上叫做学会，实际上也是一种个人的势力圈，吸收省、县各级中、高层次的行政人员为会员，出版刊物，集会活动。分会遍布各区县，几乎大一点的机关单位都设有小组。“新”是指新群中学，是一所高中学校，校址在杭州清波门膺白路上（即今南山路），阮自兼校长，用以培养其需要人。“政”即指民政厅，当时黄绍竑大权独揽，阮非黄的亲信嫡系，不能说达到有职有权，但阮适应环境，应付裕如，久于其任。

阮毅成是余姚人，但他没有在姚建置自己的关系网。我在余姚1934年4月至1940年9月任职期间，同他接触日久，他没有向我介绍过一个人，或者说情一件事，几乎不闻不问。不过当他走上厅长岗位时，我已做了七、八年的县长了，资格也老了。抗战发生，余姚地处要冲，政事繁多，我都直接请示黄绍

兹解决，很少向阮毅成汇报。三区专员贺扬灵是黄的亲信，有时则要过问和插手县事，而阮对余姚政治可说毫无影响。有一天，阮突然来故乡，站在江桥上左顾右盼，他没有通知我，但被别人发现，此人同他打招呼，要来关照我，却被阮极力制止。他对这人说起，已去过泗门镇，再到城里看一看，就回方岩去了。这人次日才同我谈起，我只一笑。阮去以后，我问地方一些人和乡镇长，都说不知道，这也说明阮的一种作风。所以余姚党政摩擦乃至对政工队谣诼繁兴，而阮以事非民政厅主管，故从不干预。

揭锦标

据我所知，所谓中统、军统的来历，是在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通令取消党内小组织以后产生的。军统是1939年间成立的，中统成立时间稍早。政工队建立以后，县党部就有所谓情报分子周昕潮专门向上反映，讲政工队的坏话。绍兴三区保安司令部也有徐鲁依、卓清宝情报室的组织机构。那时县政府里没有情报系统，只在会报室设置会报秘书。

揭锦标是常山人，浙江省警官学校本科毕业，因成绩优异，由学校派送日本留学，仍习警政。他归国后，1933年率一个省警政考察团来汤溪视察，那时我在汤溪任县长，见其青年英俊，谈吐不俗，举止有礼，深为钦佩。以前我们互不相识，这时才识其才干。1934年我调任余姚，原余姚警察局长谢钟良（贵州人），其兄在国民党部队是将级军官，来函邀他去军队任职，谢对我说要辞职了。那时警察归民政厅主管，我恰因事

去杭州，于是先问揭锦标是否愿意去余姚任局长，揭同意后，我再到民政厅第二科（主管科）疏通，看来似有把握，我便回县具文保荐。这时省主席是鲁涤平，民政厅长吕兹筹，余姚是大县，如有局长出缺，一定不乏逐鹿者。那时尚未颁行实施新县政制度，局长任免全归民政厅掌握，县长并无保荐人选之权，故须事先疏通关系。揭锦标到差以后，办事认真不苟，地方颇有好感。因为揭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学生（浙江警官学校自创办人朱家骅于1930年离浙后，即被戴笠攫夺为校长），戴笠每年来浙，揭都要向我请假去晋谒，有时则戴来电邀他去，所以说揭是军统分子，当然不假，但就我所知，当时在余姚，揭还没有搞起军统性质的组织。

政工队成立后，党政发生分歧，同时揭锦标亦是余姚抗卫会、动员会的委员，我曾屡屡对揭说起，希望他不要插手有关政工队的事情，一切由我与郭静唐商量处理。他有意见或听到什么消息，请他先向我们提出。经过1938至1940年的三年时间，我看揭还通情达理，顾全大局，做到不过问警察以外的事。我们之间始终和睦相处，整个县府各部门是团结一致抗日的，没有矛盾内耗，也没有被县党部之人的挑拨离间所中伤。我辞职之日，揭曾对我表示，他也要早日离开，免得麻烦，后来听说他到湖南做事去了。1948年，揭锦标升任省保安处副处长，是毛森的助手，那时势移境迁，我们很少来往。1949年4月，揭随周岳、毛森逃亡海外。

于1988年12月1日

郭静唐与倪永强

杨 光

编者按：这是一篇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余姚的一场势不两立的斗争史料。郭与倪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虽是同乡，却背道而驰。斗争对余姚的抗日救亡工作，至关重要。

该文经当时任国民党余姚县县长的林泽先生校阅。

1937年10月，日寇在淞沪战场失利后，便在金山卫登陆，夹击淞沪我军。接着，嘉兴、海宁、湖州相继沦陷，杭州湾一水之隔的余姚，形势也开始吃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穿着布衣短衫、年纪三十开外的中年男子，从上海回到余姚故乡，他就是郭静唐。

郭静唐又名挹青，余姚周巷人，他出生于1904年，抗战开始，他风华正茂，毅然放弃上海天马书店的业务，只身来到故乡。他回到家里，顾不得休息，就往余姚城里跑，因为他有满腔的未酬壮志，这次回余姚，满想和故乡人民一起，大干一番抗战救国事业。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郭静唐是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的思想激进，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即被国民党的清党者通缉，幸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未遭毒手。于是，他更名挹青，到浙江第三中山大学（浙大前身）读

书，后来转到上海，接办天马书店，经营进步书籍。因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他又回来，并急往余姚县党部，渴望早日共商抗日救国大事。

当时，余姚县党部的书记长是倪永强，也是周巷人，和郭不仅是同乡同行，而且年龄也相仿，不过倪是个文绉绉的白面书生罢了。

事情往往会出人的意料，郭静唐到余姚县党部里只蹲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又背起包裹回上海干他的老行当去了，这里有什么蹊跷？明眼人一想就会很清楚。因为郭静唐与倪永强他们两人的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都不同，倪永强是C.C.分子，对抗战的态度，表面上拥护，而暗地里反对。而郭静唐呢，当时虽然是个民主人士，但对抗日却是个实干家，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斗争精神。所以，他们两人好象“谷芒对麦尖”，“鸡皮贴狗皮”，碰不拢，贴不牢。倪永强当时是余姚的太上皇，真是权大势大，怎么容得无社会地位的郭静唐来共事呢？因此，想方设法要把郭撵走；而郭也想，与倪合作已到绝望，还是一走了之。所以余姚的抗日活动没有动静，更无起色。

这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正好发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主张团结全省各界人士，合力抗日，尤其认为热血青年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当时任余姚县县长的是林泽，林虽然是个外地人，但对余姚有感情，为人正直开朗，富有民族感和正义感，爱祖国，也爱青年。《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主张团结抗日，重视青年，正合他的心意，但又苦于缺乏合适人选来组织和领导抗日活动。有一天，林在办公室正在冥思苦索，忽然走进一个四十开外、身体有些微胖、满口余姚腔的人，他就是

余姚县办的农民银行经理童泉如。林见童到来，便亲昵地寒暄一番，虽然俩不是什么知交，但也相识已久，平时遇见，往往无话不谈，所以这次的话题，很快转到余姚抗日活动和组织领导的人选方面来。林认为要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必须要有一个能沟通各界的“中性”人物，以作媒介，才能把工作开展起来。童听着听着，沉思了一会笑笑说：“依我看，郭静唐先生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余姚各界人士熟悉，也有联系，同时，在余姚也有较高的声望……”。林了解郭静唐，听了童的话，确实感到比较合适，因而一言为定，由林泽县长出面，邀请郭再次回余姚来组建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救亡工作。

郭静唐接到林泽的邀请，很高兴，也有信心，所以很快第三次来到余姚。当然，林泽也非常重用他，委他为县府视察。其时，正值全省各县正在成立政治工作队，林便委他为余姚县政治工作队队长。这时，正逢余姚抗日自卫委员会改选。原抗卫委主任是倪永强，抗卫会领导机构的人员，名义上有党、政、警、农、青、妇各界人士参加，实际上被县党部倪永强一人所控制。他用抗卫会抗日之名，到处募捐筹款，结果是搞他的贪污自肥，落入腰包。这一点早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察觉和不满。

抗卫会的改选，是在县中山厅（即老城隍庙）内进行的。选举开始，主席台上的倪永强春风得意，满脸笑容，内心满以为改选不改选反正一个样，总归是在县党部的控制下，他必然是当然主任，打了一肚子的如意算盘。可是林泽县长呢，却心事重重，似乎有点坐立不安，因为他觉得抗卫会的选举好坏，直接关系到余姚今后的抗日救亡工作。坐在台下群众中间的郭静唐，却左顾右盼，谈笑风生，轻松得好象今天的改选与他无